

論錢穆及其歷史觀

黃文斌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錢穆（1895-1990）生長在近代中國，這是一個悲苦憂患的年代，故其一生治學基本上與時代及其時代的學術問題相關。其問題意識多環繞在思考「民族自救」的問題上。基本上，錢氏嘗試通過研究「歷史」及闡發「文化」來建立民族的認同感與信心，他認為缺乏這點民族自救的問題是很難獲得解決的。

1942 年以前，錢穆的著作多從事歷史的研究，他有意以「歷史」作為他建立民族認同與自信之依據，因意識到「歷史」有反映「事實」或「真相」的功能。錢氏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無論政界或知識界無不針對「救國保種」的問題提出看法。在一個眾說紛紜的時代，錢氏注意到以「歷史事實」來建立論述的可信度是一個必須的條件。

談錢穆的歷史觀不得不注意到《國史大綱》。他在《國史大綱》正文前，列有「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這四個信念皆針對當時學術問題而發。他提出國民對國史應略「有所知」，乃因「有所知」或「認識」，國民才會對民族與國家有「認同感」而產生「感情」；有「感情」才会有「愛」及願意為民族與國家奮鬥及犧牲。其次，他提到對國史的「態度」；強調國民或史家必須抱以一種「溫情」與「敬意」及不可「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的態度治史。換言之，一方面要有「敬意」，另一方面又要「負責任」。無疑的，在一本歷史書前面特別強調這些「信念」，反映出當時必有一些對國史有偏激言論或曲解國史者。錢氏還用了「虛無主義」及「文化自譴」的字眼來形容這些人的態度。可見當時國人存有一種民族自卑的心理。筆者認為這個時代的學術問題有「去民族本位化」及「尊西趨新」的現象。

錢穆的歷史觀，簡言之可謂是「民族文化歷史觀」，即以一個比較同情與欣賞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歷史及先輩民族所創造的文化。這種態度與當時主流學派以「科學方法」、「史料」、「疑古」等方式，並強調「客觀」、「去感情」不同。主講者將分析錢穆的歷史觀與其他學派的差異，並從清朝末年至二十世紀 30 年代間，中國政治與學術界的變遷來審視及討論。